

# 論元、白唱和詩

鞏本棟

## On Yuan Zhen and Bai Juyi's Poems of Exchange

*Gong, Bengdong*

淡江中文學報 第二十五期 第 199~228 頁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5, P. 199~228, December 201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in Taipei

# 論元、白唱和詩<sup>\*</sup>

鞏本棟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 摘要

元稹和白居易前後交往三十年，詩歌唱和近千首。唱和不僅有力地推動了他們的諷喻詩創作，而且，也改進了彼此的詩風、完善了其詩歌理論，促進了詩歌史的發展。

在中國文學史上，元稹與白居易並稱“元、白”，並稱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詩歌唱和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元、白前後交往三十年，唱和贈答詩近千首，為他們贏得了聲譽，也對他們自身的創作和文學史的進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唱和詩 元稹 白居易

---

\* 此文是2010年國家重大基金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批准號：10ZD130）階段性成果。

# 論元、白唱和詩

鞏本棟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 一、元、白交誼與詩歌唱和

元稹和白居易相識的時間，或在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sup>①</sup>而真正相知定交，則應在十九年（803年）以後。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在〈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中說：“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時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並自注：“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sup>②</sup>元稹在和作〈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並序〉中也說：“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sup>③</sup>元、白二人同登科第以後，又同授秘書省校書郎，這使得他們之間的交往愈益頻繁，友誼不斷加深，詩歌唱和也迅速增加了。

對初涉政壇的元、白來說，在秘書省校書郎任上的三年，是一個輕鬆愉快、令人難忘的時期，以至多年後，白居易回憶起這一時期的生活，仍然很興奮。他在詩中寫道：“疏狂屬年少，閒散爲官卑。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交賢方汲

---

① 朱金城先生據白居易元和五年（810年）〈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詩句：“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逆推之，二人相識當在貞元十七年，即801年（參其《白居易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25。陶敏等《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貞元十七年紀事同）。另，金卿東據元稹元和五年作〈和樂天秋題曲江〉中“十載定交契，七年鎮相隨”二句，定元、白相識在貞元十六年（參其〈元稹白居易“初識”之年考辨〉，文載《文學遺產》2000年第6期，頁110-112），當是逆推有誤，實則仍在十七年。

② 《白居易集》卷十三，顧學頤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頁245。

③ 《元稹集》卷十，冀勤校點，中華書局，1982年，頁116。

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秋風拂琴匣，夜月卷書帷。高上慈恩塔，幽尋皇子陂。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儒風愛敦質，佛理賞玄師。度日曾無悶，通宵靡不爲。雙聲聯律句，八面對宮棋。往往遊三省，騰騰出九逵。（略）幾時曾暫別，何處不相隨。荏苒星霜換，回環節候催。兩衙多請假，三考欲成資。”<sup>④</sup>由此可以想見他們當日呼朋喚友，挾妓將伶，四時遊覽，詩酒唱和的風流瀟灑。

自貞元二十一年（順宗永貞元年，805 年）冬至次年（憲宗元和元年，806 年）夏，元、白二人校書郎任滿後，又曾在長安一起備考制舉考試，並同登制科。這一時期，他們朝夕相處，“攻文”、“講學”，此唱彼和，切磋琢磨，更進一步使其思想政治傾向愈益接近了。元、白“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sup>⑤</sup>曾撰試策一百餘篇。元稹所擬策文今已不存，然其當年應制之策文“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對策”卻完整地保存着，其中論敦本務實，富黎民，息兵革，“薄農桑之征，興耕戰之術”<sup>⑥</sup>，與白居易在〈策林〉中論〈禦戎狄〉、〈議封建論郡縣〉、〈議井田阡陌〉等，皆同一機杼；而論取士之法，主張以“鑒貫大義、與道合符”、“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去取標準，<sup>⑦</sup>與白居易〈策林〉中的〈救學者之失〉、〈議禮樂〉等，亦如出一轍。其實，《白居易集》中今所存〈策林〉七十五篇，元稹也都應參與討論過，因而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著元稹的看法。觀元稹多年後支持唐穆宗和段文昌等人的“銷兵”政策，與白居易〈策林〉中關於“銷兵數”的觀點，並無不同，而元稹在詩歌創作上的力主諷諫，刺美現事，與白居易〈議文章〉、〈采詩〉中的看法，更是完全一致的。白居易在〈贈元稹〉的詩中曾談到他與元稹的結交時，說：“不爲同登科，不爲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sup>⑧</sup>並非虛言。

④ 同注 2，頁 245-246。

⑤ 同注 2，卷六十二〈策林序〉，頁 1287。

⑥ 同注 3，卷二十八〈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頁 335。

⑦ 同注 3，頁 337。

⑧ 同注 2，卷一，頁 8。

“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sup>⑨</sup>“跡由情合，言以心誠，遂定死生之契，期於日月可盟。堅同金石，愛等弟兄”。<sup>⑩</sup>白居易和元稹的這些話，都道出了自校書郎以來的三年多的生活對二人日後交往的重要意義。正是這一段生活，正是上述共同的思想政治傾向、共同的興趣愛好、共同的才情學識，奠定了元、白友情和交往的基礎，並由此結成了元稹和白居易的深厚友誼，成就了他們此後數十年的詩歌唱和。

對於這數十年的唱和，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所撰〈與元九書〉中曾有過一個概括。他說：“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sup>⑪</sup>元稹在〈夢遊春七十韻序〉也說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sup>⑫</sup>，詩歌唱和成了他們彼此之間議論世事、表達政見、記錄生活、抒發情感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成了他們彼此交往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間固然時有應酬，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卻都是坦誠率直的真情流露，生活中的出處進退，是非曲直，喜怒哀樂，無不可於此唱彼和中見之。

雖說自任校書郎時，元、白已“多以詩章相贈答。”然留下來的作品，卻並不多。元、白唱和的第一個重要的時期，是在元和四、五年間（809-810年）。這一時期，元、白初登政治舞臺，心態積極，都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負。元稹制舉登科授左拾遺後，即屢次上書言事，至為執政所忌。元和四年，元稹以監察御史充劍南東川詳覆使，出使東川，按瀘州監官任敬仲獄，彈劾節度使嚴礪，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東川。稍後分務東台，復彈奏數十事，終至被貶江陵（今屬湖北）。白居易亦屢陳時事請降系囚，蠲租稅，放宮人，絕進奉，禁掠賣良人等，得到朝廷採納。這一時期的元、白唱和，無形中也成了諷諫朝政，刺美現事，反映社會生活的手段和工具，充滿了昂揚奮勵的精神。在唱和之中，元、

⑨ 同注2。

⑩ 同注3，卷六十〈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頁626。

⑪ 同注2，卷四十五，頁965。

⑫ 同注2，卷十四《和〈夢遊春詩〉一百韻序》引，頁1130。

白相互競爭，皆欲超越對方，創作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

元和五年，元稹以得罪權要被貶官江陵士曹參軍長達六年，直至元和十年（815年）初方回京，旋又外任通州（今四川達縣）司馬，元和十三年（818年）改官虢州（今河南靈寶）長史，一年後入朝為膳部員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遷祠部郎中、知制誥。白居易元和三年（808年）任左拾遺，充翰林學士，六年（811年）丁母憂，至九年（814年），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次年即以上書言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十三年底改官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元和十五年，自忠州回朝，授主客郎中、知制誥。至此，元、白方又都重新回到京城任職。多年的貶謫生涯，無論對元稹還是白居易來說，都是一場人生的痛苦磨難，這讓他們深深感受到了為政的不易和世態的炎涼。初入政壇的棱角已被銷磨了許多，原來積極奮發的心態也不免變得有些消沉。這一時期元、白唱和詩的數量很多。其中既有對社會政治現實的關注，然而更多地表達的則是遭遇不幸與不平時的憂愁憤懣、是對這種遭遇的反思以及朋友之間的相互安慰與掛念。像元稹的〈酬樂天頻夢微之〉：“山水萬重書斷絕，念君憐我夢相聞。我今因病魂顛倒，唯夢閒人不夢君。”<sup>13</sup>詩意翻新出奇，情尤真摯。在此唱彼和中，進一步促進了元、白詩歌創作藝術的不斷改進和提高。

穆宗長慶元年（821），元稹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賜紫金魚袋，次年為相，然因與裴度有矛盾，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八月，元稹為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直到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前後在浙七年。白居易則於長慶元年求外任，七月，出為杭州刺史。四年正月，穆宗卒，敬宗李湛即位。五月，白為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次年（敬宗寶曆元年，825年）又出為蘇州刺史，寶曆二年，罷官返洛陽。這是元、白晚年唱和比較集中的時期。時元稹在越州，白居易在杭州、蘇州。二人遣人竹筒傳遞，唱和頻繁，其數十年唱和的結晶：《元白唱酬集》十六卷，即結集於此時。《因繼集》卷一，也在此時編成（卷二、卷三也於稍後編成）。元、白與他人唱和的《三州唱和集》一卷（與崔玄亮）、《杭越寄和詩集》一卷（與李諒），元稹與劉禹錫、李德裕唱和的《吳越唱和集》等，也大都

<sup>13</sup> 同注3，卷二十，頁232。

成於此時和稍後。傳誦一時，蔚為盛事。大和五年，元稹卒後，白居易在《祭微之文》中寫道：“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為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sup>14</sup>可為二人一生詩歌唱和的總結。

## 二、元、白唱和及其諷喻詩

元稹和白居易有明確的詩歌創作理念，那就是美刺比興，諷喻時事。早在貞元、元和之際，元稹和白居易、李紳等人對此就有共同的認識，並已經付諸實踐。<sup>15</sup>元稹在其《樂府古題序》中說道：“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sup>16</sup>白居易也認為：“古之為文者，上以紉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縷句將焉用之。”<sup>17</sup>所以他在〈與元九書〉中又明確地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sup>18</sup>這些看法都具有重要的詩學意義。

對於自己的詩歌創作，元稹和白居易所看重的，也是那些美刺比興，諷喻時事的作品。白居易〈與元九書〉曰：“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

<sup>14</sup> 同注2，卷六十九。

<sup>15</sup> 如白居易元和三或四年所作〈賀雨〉、〈秦中吟〉十首等（〈秦中吟〉作年參陳才智《元白詩派研究》第三章〈元白詩派的新樂府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183），“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長慶集序〉，頁554）

<sup>16</sup> 同注3，卷二十三，頁255。

<sup>17</sup> 同注2，卷六十五〈策林〉七十五篇其六十八〈議文章〉。

<sup>18</sup> 同注2，卷四十五，頁962。



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略）。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sup>19</sup>

元、白的諷喻詩及其所宣導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精神，在宋代即有梅堯臣、蘇門弟子張耒、晁補之等承之，而又有一定的發展。南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專列新樂府辭一類，於解題中引元稹〈樂府古題序〉，謂：“由是觀之，自《風》《雅》之作，以至於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審音者。儻采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焉。”<sup>20</sup>可看出他對元、白諷諭詩的重視。至明亦有胡應麟稱之，曰：“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涼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仿杜陵爲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詩集）》。語句亦多仿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沉著，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天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己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sup>21</sup>指出元、白樂府諷諭詩的淵源和異同，並明謂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乃是在元稹所作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到了清代，元、白的諷諭詩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如沈德潛就盛稱“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喻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sup>22</sup>將諷喻詩與《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聯繫起來，論詩主張溫柔敦厚的沈德潛，自然對能承傳“風人之遺意”的諷喻詩，評價較高。進入近現代以來，對元、白諷喻詩的認識和評價更超越了前人。如陳寅恪先生就指出：“元、白集中俱有新樂府之作，而樂天所作，尤勝於元，洵唐代詩中之鉅制，吾國文學

<sup>19</sup> 同注2，卷四十五，頁964-965。

<sup>20</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十，中華書局，1979年，第4冊，頁1262-1263。

<sup>21</sup> 《詩藪·內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53。

<sup>22</sup> 《說詩碎語》卷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212。



史上之盛業也。”<sup>23</sup>這樣的評價，已並非只著眼於諷喻，而是對元、白詩作了全面考察之後得出的結論。陳先生進一步指出：“今《白氏長慶集》三、四兩卷所載〈新樂府〉五十首，即因公垂、微之所詠而作也。”<sup>24</sup>“夫元、白二公，詩友也，亦詩敵也。故二人之間，互相仿效，各自改創，以蘄進益。有仿效，然後有似同之處；有改創，然後有立異之點。儻綜合二公之作品，區分其題目體裁，考定其製作年月，詳繹其意旨詞句，即可知二公之於所極意之作，其經營下筆時，皆有其詩友或詩敵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創，從同立異，以求超勝，決非廣泛交際率爾酬和所爲也。”<sup>25</sup>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胡應麟和陳寅恪的話，其實已告訴我們，元稹和白居易的諷喻詩，原是其詩歌唱和的產物。正是以唱和推闡其共同的詩歌主張，以唱和切磋詩藝，互相學習，從同立異，競相超越，才創作出了中國文學史上這獨具風采的諷喻詩。陳先生所說的“仿效改創，從同立異，以求超勝”，正是同題共作的詩歌唱和性質所要求的。從詩歌唱和的角度，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元、白的諷喻詩。

元、白以唱和的方式推動諷喻詩的創作，始於元和四年元稹作〈新題樂府〉十二首。其〈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云：“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sup>26</sup>李紳原作已不存，我們無從比較，然而元稹在李紳的啓發下、或以李詩爲契機而進行創作的這一組新題樂府，此唱彼和，從同立異，有意識地來宣傳自己的詩歌理念，針砭當日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問題，確是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像〈上陽白髮人〉諷刺天寶以來後宮嬪妃、宮女以及公主、諸王之被幽閉深宮，〈華原磬〉刺天寶以來鄭聲淆亂雅音，玄宗沉湎新聲，終至胡寇亂華，〈五弦彈〉批評唐德宗好五弦勝過任賢，〈法曲〉不滿安史之亂以來的胡風盛行，〈西涼伎〉由開、天年間的涼州的繁盛，寫

<sup>23</sup> 《元白詩箋證稿》頁1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sup>24</sup> 同23，頁8。

<sup>25</sup> 同23，頁300。

<sup>26</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77-278。

到安史亂後的國土蹙迫，頗寄感慨等等，既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多方面的社會現實，又包含著其在詩歌藝術上的思考。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大致與元稹的和作寫在同一年。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謂其所作，“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於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論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sup>27</sup>白居易雖不言是和元稹之作，然以白居易與李、元的關係，他在創作〈新樂府〉五十首之前，必能見到李紳和元稹所作；而若與元稹之作相比較，其必爲受李紳、元稹二人詩啓發，並意欲超過李、元之作的唱和詩無疑。其所以不言和作者，是因爲李、元之作已構成一組完整獨立的唱和，故不會再贈與白居易，和而復和，此時尚無先例；又，白居易雖受李、元啓發，然意欲從同立異，超越李、元，故其新樂府詩的數量已大大超過李、元之作，已非通常的唱和形式所能限，自可不必言和了。

唱和詩的性質是同題共作。<sup>28</sup>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的題目，在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中全部出現了。這已可見白居易的詩是和作。元稹和李紳之作，其順序與李紳原作相同<sup>29</sup>，是沒有問題的，而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的排列順序，原來卻也與元稹的和作相同。據敦煌寫本白居易〈新樂府〉詩卷，其排列的先後順序，與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大體一致，<sup>30</sup>這正好說明了白

<sup>27</sup> 同注2，卷三，頁52。

<sup>28</sup> 參拙撰〈論唱和詩詞的淵源、性質和特點〉，載《中國詩學》第1輯，1992年。

<sup>29</sup> 如陳寅恪先生即指出：“微之詩題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元白詩箋證稿》，頁127）

<sup>30</sup> 敦煌本〈新樂府〉排列順序：〈上陽人〉、〈百煉鏡〉、〈兩珠閣〉、〈華原磬〉、〈道州民〉、〈別母子〉、〈草茫茫〉、〈天可度〉、〈時世妝〉、〈司天臺〉、〈胡旋女〉、〈昆明春〉、〈繚綾歌〉、〈賣炭翁〉、〈折臂翁〉、〈鹽商婦〉（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的影印宋紹興本《白氏文集》後附）。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順序依次為：〈上陽白髮人〉、〈華原磬〉、〈五弦彈〉、〈西涼伎〉、〈法曲〉、〈馴犀〉、〈立部伎〉、〈驃國樂〉、〈胡旋女〉、〈蠻子朝〉、〈縛戎人〉、〈陰山道〉。其中，〈上陽人〉、〈華原磬〉和〈胡旋女〉三首詩是兩本共有的，其排序一致。所以，謝思煒先生指出：“據此不妨作出這

居易的〈新樂府〉詩五十首，應是和元稹與李紳之作。

白居易〈新樂府〉詩五十首的題下與文中注，也與李紳和元稹之作相同，說明其屬於同題共作的詩歌唱和。如〈上陽白髮人〉，元作首句“天寶年中花鳥使”下自注云：“天寶中，密號採取豔異者為花鳥使。”<sup>31</sup>白居易同題之作詩句“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下自注，亦曰：“天寶末，有密采豔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sup>32</sup>幾乎完全相同。元稹〈華原磬〉題下注引“李《傳》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sup>33</sup>白居易同題之作題下注亦有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sup>34</sup>又，元稹〈馴犀〉詩引李〈傳〉云：“貞元丙子歲，南海來貢，至十三年冬，苦寒，死于苑中。”<sup>35</sup>白居易〈馴犀〉詩題下也有相同小注：“貞元丙子歲，南海進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矣。”<sup>36</sup>元稹〈立部伎〉引李〈傳〉云：“‘太常選坐部伎，無性靈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靈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可知矣。’李君作歌以諷焉。”<sup>37</sup>白居易〈立部伎〉題下亦注：“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聲可知矣。”<sup>38</sup>元稹〈縛戎人〉詩中

---

種假設，白居易的〈新樂府〉組詩在寫出、編定中經過若干時日，在未經系統編定前或許曾暫時採用元稹《新題樂府》的順序並有所流傳，而敦煌本所根據的正是這樣一個流傳本。”（〈敦煌本白居易詩再考證〉，見《白居易集綜論》，頁6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謝先生的假設是有道理的，而在我們看來，這裏表現出的先後一致的順序，正說明了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是和元稹與李紳之作。

<sup>31</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78。

<sup>32</sup> 同注2，卷三。此詩元作題下無注，然白詩則有，曰：“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依理推之，或出自李紳詩。

<sup>33</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79。

<sup>34</sup> 同注2，卷三，頁58。

<sup>35</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83。

<sup>36</sup> 同注2，卷三，頁69。

<sup>37</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84。

<sup>38</sup> 同注2，卷三，頁57。

“眼穿東日望堯雲，腸斷正朝梳漢發”兩句下自注：“延州鎮李如暹，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西蕃，及歸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沒蕃者服衣冠，如暹當此日，由是悲不自勝，遂與蕃妻密定歸計。”白居易同題之作“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兩句下亦有自注：“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沒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勝，遂密定歸計也。”元稹〈陰山道〉（290-291）題下存“李〈傳〉云：元和二年，有詔悉以金銀酬回鶻馬價。”<sup>39</sup>詩由買馬耗帛寫到奢侈之風，對織工表示同情。白同題之作則只寫前事。詩中有句：“元和二年下新敕，內出金帛酬馬直。”與李傳一致。諸如此類，白居易〈新樂府〉幾完全與李、元所作相同，足證其為受李、元啟發而和作。

詩歌唱和，和作要與原唱相互照應，即所謂“從同”。如果我們將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內容與元詩略作比較，就不難發現其從同之處甚多，因而其理應屬於唱和之作。比如元稹的〈華原磬〉，原意是諷刺天寶以來鄭聲淆亂雅音，玄宗沉湎新聲，終至胡寇亂華的，白和作前半雖如其小序所說，是“刺樂工非其人也”，然接下來所寫詩意卻與元詩相同。再如元稹〈驃國樂〉題下引“李傳云：貞元辛巳歲始來獻。”詩寫驃國樂不當居雅樂之上，德宗納此樂或意在柔遠，然教化應分源委，先中土後外邦。白居易〈驃國樂〉小序則曰：“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題下並注：“貞元十七年來獻之。”詩意和小注全同元作。又如元稹的〈馴犀〉，比較唐德宗建中、貞元年間放馴象與圈馴犀兩事，主張順時任性，以喻治國。白居易〈馴犀〉則“感為政之難終也”。先寫馴犀，後點出馴象，以刺唐德宗為政有始無終，也與元稹詩意相近。在白居易的詩中，有些句子顯然是受元稹詩的啟發而作的。如元稹有〈五弦彈〉，詩曰：

趙壁五弦彈徵調，徵聲巉絕何清峭。辭雄皓鶴警露啼，失子哀猿繞林嘯。  
風入春松正淩亂，鶯含曉舌憐嬌妙。鳴鳴暗溜咽冰泉，殺殺霜刀澀寒鞘。  
促節頻催漸繁撥，珠幢門絕金鈴掉。千鞞鳴鏑發胡弓，萬片清球擊虞廟。

<sup>39</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90。

眾樂雖同第一部，德宗皇帝常偏召。旬休節假暫歸來，一聲狂殺長安少。  
主第侯家最難見，按歌按曲皆承詔。水精簾外教貴嬪，玳瑁筵心伴中要。  
臣有五賢非此弦，或在拘囚或屠釣。一賢得進勝累百，兩賢得進同周召，  
三賢事漢滅暴強，四賢鎮岳甯邊徼，五賢並用調五常，五常既序三光曜。  
趙璧五弦非此賢，九九何勞設庭燎。<sup>40</sup>

由五弦寫到五賢，諷刺唐德宗好五弦勝過任用賢士。白居易在此稍前曾作過〈秦中吟〉十首，內有〈五弦〉一篇，詩中寫道：“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弦，宛轉當胸撫。大聲粗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喜，轉作猿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窗琴，日日生塵土。”<sup>41</sup>詩意謂今樂不如古樂，然主要還是寫了趙璧高超的彈五弦的技巧。白居易新樂府〈五弦彈〉的主旨是“惡鄭之奪雅也”，詩意略同此前的〈秦中吟〉，而對趙璧的彈撥藝術有更進一步的描寫，這些描寫顯然受到了元稹詩的啟發。且看白詩：

五弦彈，五弦彈，聽者傾耳心寥寥。趙璧知君入骨愛，五弦一一為君調。  
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風拂松疏韻落。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鶴憶子籠中鳴。  
第五弦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五弦並奏君試聽，淒淒切切復錚錚。  
鐵擊珊瑚一兩曲，冰寫玉盤千萬聲。鐵聲殺，冰聲寒，殺聲入耳膚血寒，  
慘氣中人肌骨酸。曲終聲盡欲半日，四座相對愁無言。座中有一遠方士，  
唧唧咨咨聲不已。自歎今朝初得聞，始知辜負平生耳。唯憂趙璧白髮生，  
老死人間無此聲。遠方士，爾聽五弦信為美，吾聞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  
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融融  
曳曳召元氣，聽之不覺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弦人不撫。更從

<sup>40</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80。

<sup>41</sup> 同注2，卷二，頁34。

趙壁藝成來，二十五弦不如五。”<sup>42</sup>

“第五弦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來自元詩的“嗚嗚暗溜咽冰泉”。“鐵聲殺，冰聲寒，殺聲入耳膚血寒，慘氣中人肌骨酸”，又多半受到元詩“殺殺霜刀澀寒鞘。促節頻催漸繁撥，珠幢鬥絕金鈴掉。千鞞鳴鐃發胡弓，萬片清球擊虞廟”的啓示。又如，元稹〈立部伎〉寫胡樂盛而雅樂衰。詩中有句道：“宋沈嘗傳天寶季，法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來，九廟千門虜塵澆。”<sup>43</sup>而白居易〈法曲〉詩中也有類似的句子：“法曲法曲合夷歌，夷歌邪亂華聲和。以亂幹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sup>44</sup>顯從元詩而來。元稹此詩中有“頃向圓丘見郊祀，亦曾正旦親朝賀”兩句，而白居易〈立部伎〉詩旨既同元作，詩中亦有“圓丘後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這樣類似的句子，其間的聯繫不難見出。其他如〈胡旋女〉、〈蠻子朝〉、〈縛戎人〉等，白居易的創作主旨也無不與元稹之作相同。

詩歌唱和，既要“從同”，與原唱相互照應，更需要“立異”，別出心裁，力求創新，以相超越。事實上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較之元作，立異之處更多，藝術上也更成熟，在整體上或已超過元稹的〈新題樂府〉。<sup>45</sup>不過，元稹的〈新題樂府〉十二首，無論在主題的取向，還是在構思和措辭用語上，都曾給白居易的創作帶來了很大的啓發，則是不容置疑的。

有意思的是，對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李紳和元稹的態度很不一樣。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中寫道：“苦教短李伏歌行”，並自注說：“李二十嘗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李紳似已甘拜下風，白居易未提元稹，實際上元稹並沒有服氣。在白居易作此詩後二年，即元和十二年（817年），元稹就又創作了一組以舊題而出新意的諷喻詩，這便是和劉猛、李餘的〈樂府古題〉十九首。創

<sup>42</sup> 同注2，卷三，頁69-70。

<sup>43</sup> 同注3，卷二十四，頁284。

<sup>44</sup> 同注2，卷三，頁56。

<sup>45</sup> 此點陳寅恪先生論之甚詳，參其《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第六章〈古題樂府〉。



作的緣起和宗旨，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有詳細的交待。他將古今詩歌分類剖析，比較異同，並謂：“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sup>46</sup>在元稹看來，古今歌詩，無論何種體裁，無論古題新題，比興寄託，諷喻時事，都是第一要義。“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固然值得提倡，而“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的作品同樣可取。此前，白居易既然已在新樂府的創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那麼元稹在古題樂府方面，借古題而立新義，述古義而自創新詞，就無形中把白居易放到了自己的競爭對手的位置上，有著要與白居易進行一番較量的意味了。正如陳寅恪先生所正確地指出的，“微之於新題樂府，既不能競勝樂天，而藉和劉猛、李餘之樂府古題之機緣，以補救前此所作新題樂府之缺憾，即不改舊時之體裁，而別出新意新詞，以蘄追及樂天而軼出之也。（略）豈微之特擇此見其所長，而以持傲其詩敵歟？”<sup>47</sup>誠然。

比如元稹和劉猛的〈田家詞〉一首。詩曰：“牛吒吒，田確確，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轤。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耒耜作斤斫。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sup>48</sup>對連年戰亂、官府無能進行諷刺，對百姓不堪重負深表同情，而通篇以農夫口吻出之，不著一字，卻諷刺辛辣。其手段已不亞於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其他如〈夢上天〉、〈董逃行〉、〈夫遠征〉等，“皆依舊題而發新意。詞極精妙，而意至沉痛。取較樂天新樂府之明白曉暢者，別具蘊蓄之趣。蓋詞句簡煉，思致微婉，此為元白詩中不多見者”。<sup>49</sup>

<sup>46</sup> 同注3，卷二十三，頁255。

<sup>47</sup> 同注23，頁302。

<sup>48</sup> 同注3，卷二十三，頁260。

<sup>49</sup> 同注23，頁303。



### 三、元、白唱和及其詩歌風格的變化

元稹在〈《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中曾寫道：“勇贈‘棲鸞’句，慚當‘古井’詩。多聞全受益，擇善頗相師。脫俗殊常調，潛工大有爲。（略）勝概爭先到，篇章競出奇。輸贏論破的，點竄肯容絲。”<sup>50</sup>形象地描繪出他與白居易在詩歌唱和時，相互推重，相互學習，從同立異，競相超越的情形。

相互學習與競相超越，原亦不可遽分。元稹早在任校書郎前有〈菊花〉一詩，白居易就欣賞備至，曾作〈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有句云：“相思只傍花邊立，盡日吟君詠菊詩。”題下自注：元九云：“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sup>51</sup>元稹也曾稱白詩“鴻洞卓犖，令人興起心情”<sup>52</sup>。二人還互相把對方的詩歌書於屏風或置之座右。元和十二年（817年）九月，元稹自興元歸通州，經閬州遊開元寺，寫白詩於寺壁，白在江州亦寫元詩於屏風。元稹在〈閬州開元寺題樂天詩〉中寫道：“憶君無計寫君詩，寫盡千行說向誰。題在閬州東寺壁，幾時知是見君時。”<sup>53</sup>不約而同，白居易在此年冬則書元詩於屏風。其〈題詩屏風絕句並序〉曰：“十二年冬，微之猶滯通州，予亦未離湓上，相去萬里，不見三年，鬱鬱相念，多以吟詠自解。前後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數百篇，雖藏於篋中，永以爲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見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小麗絕者，凡一百首，手自題錄，合爲一屏。舉目會心，參若其人在於前矣。前輩作事，多出偶然，則安知此屏不爲好事者所傳，異日作九江一故事爾。因題絕句，聊以獎之。”<sup>54</sup>由此都可見元、白友誼和他們在詩歌創作上的共同的理念、追求與相互推重與學習。

元、白在詩歌創作上的這種相互推重與學習，給他們彼此詩歌創作的發展帶來了重要影響。元和五年春，元稹彈劾河南尹房式不法，令其停職，反被罰俸，

<sup>50</sup> 同注3，卷十，頁116-117。

<sup>51</sup> 同注2，卷十四，頁272。

<sup>52</sup> 同注3，卷十，〈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序〉，頁116。

<sup>53</sup> 同注3，卷二十，頁226-227。

<sup>54</sup> 同注2，卷十七，頁1373。

應詔回京。在回京途中，又以在敷水驛與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爭廳，旋為內外權臣所排斥，被貶江陵士曹參軍。元稹離京時，白居易與之話別，並贈詩一軸。元稹至江陵後，將途中所作之詩寄給白居易，白居易對這些作品有一個評價。他說：

（既與元稹話別），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銷憂懣，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sup>55</sup>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迫于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緘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即時如意。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閑，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並別錄〈和夢遊春詩〉一章，各附於本篇之末，餘未和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sup>56</sup>

白居易贈與元稹的是哪二十首詩，白氏沒有說，然觀《白居易集》，與〈和答詩〉十首同卷且編於其前的諷喻詩，有〈續古詩〉十首、〈贈友詩〉五首和〈寓意詩〉

<sup>55</sup> 十七首似也不都是途中所作，如元稹在〈春蟬〉一詩中說：“我自東歸日，厭苦春鳩聲。作詩憐化工，不遣春蟬生。”可知〈春鳩〉一首，是他自劍南東川詳覆使回京時所作。又，〈苦雨〉一首，有“江瘴氣候惡，庭空田地蕪”云云，已是到江陵後的語氣。

<sup>56</sup> 同注2，卷二《和答詩十首序》，頁39-40。

五首，可知白氏所說的二十首詩，當即〈續古詩〉十首等。元、白詩俱在，這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以唱和贈答而改進詩歌創作的絕好例證。

白居易〈贈友詩〉五首，並非寫友情，而是借題發揮，議論治政，言多切直。〈續古詩〉十首和〈寓意詩〉五首，與之不同。前者主要寫閨怨、寫苦節之士離群索居的寂寥之情，和有志難騁的悲懷以及對讒佞當道、君臣難遇的憂憤；後者則寫富貴、友情皆不可恃，而貴賤強弱、高下大小等，亦無等差。其手法則多用比興寄託，風格較為蘊藉。比如〈寓意詩五首〉其一：

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後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圍。天子建明堂，此材獨中規。匠人執斤墨，采度將有期。孟冬草木枯，烈火燎山陂。疾風吹猛焰，從根燒到枝。養材三十年，方成棟樑姿。一朝為灰燼，柯葉無子遺。地雖生爾材，天不與爾時。不如糞土英，猶有人掇之。已矣勿重陳，重陳令人悲。不悲焚燒苦，但悲採用遲。

通篇詠物，其所寓托的天生其材，終致毀棄的悲慨，溢於言表。這些作品，雖仍不免率直，然與此前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五十首〉等諷諭詩相比，手法既多用比興，風格亦明顯委婉了許多。

元稹赴江陵途中所作的十七首詩，今冠於《元氏長慶集》。這十七首詩多是以沿途所見的景物起興感發，而寓托自己對社會、政治的思考的。如〈思歸樂〉由思歸鳥的鳴聲，反其意以自遣，表現出其不為權勢所屈的志節。途經青雲嶺，作〈青雲驛〉詩，“病其雲泥一致”，高下良莠不分。過四皓廟，成〈四皓廟〉詩，“譏其出處不常”<sup>57</sup>，守節不常。厭深山之中蟬聲鼎沸，而作〈春蟬〉，恨物傷其類，則作〈雉媒〉。〈芳樹〉、〈桐花〉，歎美好事物生不得其所，不得其時；〈賽神〉、〈古社〉，抨擊鄉間僻壤陋習，而官不能禁，於是想像狐魅雖得意一時，終歸於覆滅。其創作手法，則多用比興寄託。像〈兔絲〉一首就寫道：

<sup>57</sup> 同注3，卷十，《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頁118。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榛與荊。荊榛易蒙密，百鳥  
撩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斫將去，柔蔓與之並。翳薈生可  
恥，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鶻度海食，應龍升天行。  
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纏縈竟何者，荊棘與飛莖。

先提出“人生莫依倚”的道理，接下去便以免絲附榛荊相比，形象而真切。

將元稹的這些作品與白居易的原作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在比興寄託手法的運用上，前者確實曾受到後者的影響。其實，元稹對詩風的改進，並不限於上述十七首詩。在貶江陵的途中，元稹還曾寫過一首〈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峯館夜對桐花寄樂天〉，雖在十七首之外，然詩風亦較前為含蓄蘊藉。詩曰：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勝情，低徊拂簾幕。葉新陰影細，露重  
枝條弱。夜久春恨多，風清暗香薄。是夕遠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睽  
違，非言官好惡。奏書金鑾殿，步屣青龍閣。我在山館中，滿地桐花落。<sup>58</sup>

月色朦朧，樹影婆娑，山館寂寥，清寒淒惻，貶逐之臣，獨處此境，徘徊傍徨，情何以堪。難怪白居易讀此詩後會情不自禁地慨歎“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憶君此夜心。一章一遍讀，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了。<sup>59</sup>元稹在途中和到江陵所作的其他詩歌中，如〈感夢〉、〈種竹〉、〈和樂天別弟後月夜作〉等等，也都可以說是沒有“詞犯文繁”之病的。

當然，這一時期無論是白居易的原作還是元稹的十七首詩，乃至白氏的〈和答詩十首〉，仍未能完全擺脫“意太切而理太周”的弊病。比如元稹的〈陽城驛〉一首，詩中敘述陽氏功業，稱其忠孝節義，憫其遭遇，雖“一一皆實錄，事事無子遺”<sup>60</sup>，然議論、敘事終不免過於瑣屑冗長。其餘如白居易的《和〈大嘴

<sup>58</sup> 同注3，卷六，頁63。

<sup>59</sup> 同注2，卷九，頁749。

<sup>60</sup> 同注2，卷二《和〈陽城驛〉》，頁220。

烏》、《答〈四皓廟〉》等，也往往如此。由理論到實踐，詩風的改進，原需要一個過程。而且，這種改進，不但得益於彼此之間的互相學習或互相影響，有時候更需要互相激發，互相競爭。也許是元稹個性中爭強好勝的因素更多的緣故，所以，元稹後期詩風的變化，較之白居易，似更自覺和明顯。

穆宗長慶三年（823年）七月，白居易出為杭州刺史。僅隔一月，元稹自同州調任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二州比鄰，元、白唱和頗多。其中固有旗鼓相當者，如白居易〈雪中即事寄微之〉及元稹和作〈酬樂天雪中見寄〉，都寫雪後景物；白居易〈重題別東樓〉和元稹的《和樂天〈重題別東樓〉》，皆寫東樓朝夕晴雨景象變幻和杭州民風習俗百態。然在多數情況下，則以元稹所作為較勝。像元稹的〈以州宅誇於樂天〉和〈《重誇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

州城迴遶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  
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

仙都難畫亦難書，暫合登臨不合居。繞郭煙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曉動千門辟，湖色宵涵萬象虛。為問西州羅剎岸，濤頭衝突近何如。<sup>⑥1</sup>

前一首以蓬萊仙境比會稽山水，後一首則著眼於人間會稽的繁麗景象，意謂更勝過仙境。而皆從大處落筆，景色閎麗，氣象闊大。

再如元稹的〈和樂天早春見寄〉：

雨香雲澹覺微和，誰送春聲入棹歌。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東面受風多。  
湖添水劑消殘雪，江送潮頭湧漫波。同受新年不同賞，無由縮地欲如何。<sup>⑥2</sup>

白居易原唱〈早春憶微之〉，首尾兩聯寫歎老傷懷，感物思友，中兩聯寫早春景象，卻說“可道眼前光景惡”。實無可稱。然元稹此詩則描寫江南初春景物極為

⑥1 同注3，卷二十二，頁244-245。

⑥2 同注3 卷二十二，頁249。

細緻，由感覺、聽覺而視覺，渲染出早春時節的勃勃生機，已遠勝白詩。其他如元稹在〈酬樂天早春閒遊西湖（略）〉中所寫：“雪盡纔通屐，汀寒未有蘋。向陽偏曬羽，依岸小遊鱗”等詩句<sup>63</sup>，也都是寫景絕佳的。

元稹在江陵期間與白居易的唱和中，寫南方風物，已有奇崛的傾向。如元稹的〈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寫南方物候飲食，道途所慎，離愴之懷，風格就很奇崛。白居易則有〈《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因敘嶺南方物以諭之並擬微之送崔二十一之作》〉，乃明謂擬元稹之作，元復有和作〈和樂天送客遊嶺南二十韻〉“次用本韻”（十二，139）。越中唱和，這種風格仍有發展。像大和三年，元稹的〈春分投簡陽明洞天作〉五十韻，詩風甚奇，而白居易的和作〈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也是與原作相應相似的。

元、白唱和，不但影響了彼此的詩歌創作風格，也影響到其詩歌創作的體裁。元、白交誼深厚，書信往來和詩歌唱和頻繁，乃至二者都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自元稹貶江陵後，將二者合而為一，即以詩代書的形式，開始出現在他們的唱和贈答中。在元稹貶江陵後寄給白居易的詩歌中，有〈夢遊春七十韻〉一首，是詩雖並未說要以詩代書，然實則引發了元、白此後以詩代書的長篇排律的唱和，推動了敘事詩的發展。敘事詩的創作，在白居易元和元年寫〈長恨歌〉時，已進行了可喜的嘗試，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元稹作〈夢遊春七十韻〉，未必沒有白居易〈長恨歌〉的影響，<sup>64</sup>然白氏詩是歌行體，而以排律的形式敘事，則是元稹的開拓。元稹在詩序中說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sup>65</sup>已是準備將昔日所經歷的情感上的隱密之事告與摯友。詩中敘述與鶯鶯的遇合，與韋叢的婚姻，以及直節遭貶的經歷，一一道來，略無隱晦，其中有眷懷，有感慨，也有自解自慰，頗為通達。白居易和作〈和夢遊春一百韻並序〉，敘事大致同於原詩，末則以佛理開諭之。然二詩敘事，還都嫌過於平直。

稍後白居易作〈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中自注“自與微之別經七月，三

<sup>63</sup> 同注3，卷十三，頁144。

<sup>64</sup> 一般認為元稹的〈連昌宮詞〉受白居易〈長恨歌〉的影響。

<sup>65</sup> 同注2，卷十四〈和夢遊春一百韻序〉引，原文已佚。



度得書”），追敘自元、白相識以來的交往、友誼，歷歷分明；而其間對昔日同遊京郊，詩歌唱和情景的回憶，對朋友的離別相思，委曲真摯。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敘事略同白詩，而記二人唱和情狀和江陵景物風習尤詳。如詩中寫後者云：“草沒章台址，堤橫楚澤湄。野蓮侵稻隴，亞柳壓城陴。遇物傷凋換，登樓思漫彌。金攢嫩柳丁，豎泛遠鷗鷺。仰竹藤纏屋，苦茆荻補籬。”<sup>66</sup>同樣多有可取。

因爲是以詩代書，一些不易用詩句表達的內容，元稹和白居易往往用自注的方式進行傳達。當然，在詩中加注，在元稹使東川時已經出現，至此，詩中自注就更多，並延伸到其他作品的創作中。後元、白在通州、江州唱和之作，如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和元稹的〈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並序〉等，率皆如此。相互學習與相互競爭，敘事詩的創作，在元、白唱和的過程中逐漸走向成熟。<sup>67</sup>

#### 四、元、白唱和與其詩歌觀念的發展

元、白以詩歌的形式唱和，擴而大之，又以書信往來討論詩歌。

元稹在詩歌創作上有自覺的追求，似比白居易要早。元和十年，元稹在通州時，有〈敘詩寄樂天書〉，其曰：

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

<sup>66</sup> 同注3，卷十，頁118。

<sup>67</sup> 元稹對白居易的百韻律詩是很推重的。其〈上令狐相公詩啟〉曰：“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又，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詩一百韻序〉又謂白詩：“鴻洞卓犖，令人興起心情。且置別書，美予前和七章，章次用本韻，韻同意殊，謂為工巧。”由此可見，元、白唱和，互有長短。長篇巨制，白或勝元，而因難見巧，尤其在押韻上，元稹則是次韻的首倡者，此後，次韻遂成為常事。



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sup>68</sup>

可知其年少時，與白居易相識之前，已對詩歌應有為而作，應志“存寄興”，有了清醒的認識。而白居易雖在詩歌史的發展上，與元稹所見略同，且自云“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然又謂：“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sup>69</sup>則在理論上的自覺認識，似尚在元稹之後。又，元稹早年論及陳子昂和杜甫，已能從興寄衡之，可謂卓見。元和八年，杜嗣業遷其祖杜甫之柩於河南偃師，請元稹為撰墓誌銘，元稹又論道：“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略）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槩賦詩，故其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歎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覈其

<sup>68</sup> 同注3，卷三十，頁351。

<sup>69</sup> 同注2，卷四十五，頁961。

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sup>⑦⑩</sup>既對詩歌史有著切實的認識，故能進一步從集大成的高度對杜甫的詩歌給予高度的評價，而從這一角度來看李白的詩歌創作，其詩自不免較杜稍遜一籌。元稹此論，在中唐以後即被認爲是“李杜優劣論”，從之者多，反對者亦所在有之，<sup>⑦⑪</sup>至元好問則反譏元稹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碣砮。”<sup>⑦⑫</sup>其實，元稹何嘗不識杜詩中的“連城壁”。觀其〈敘事寄樂天書〉與〈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所論可知也。

元稹的看法影響了白居易。元和十年末，貶官江州的白居易，寫了一封長信給元稹，即著名的〈與元九書〉。然看他信中論詩歌史的發展，論杜甫詩等，與元稹〈敘詩寄樂天書〉一一相應，皆不出元稹所論之範圍。如白居易論李杜，曰：“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參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翫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sup>⑦⑬</sup>其中與元稹看法的聯繫，不難見出。

元稹在〈敘詩寄樂天書〉中又對自己歷年的詩歌作過一個分類。他說：

<sup>⑦⑩</sup> 同注3，卷五十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序〉，頁600-601。

<sup>⑦⑪</sup> 諸所爭論，可參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卞孝萱文集》第一卷，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309-312；郭紹虞先生《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

<sup>⑦⑫</sup> 郭紹虞《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小箋》其十，頁65。

<sup>⑦⑬</sup> 同注2，卷四十五，〈與元九書〉，頁961-962。

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于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按指樂府）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按此當指古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鬟，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已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sup>74</sup>

他對詩歌的分類，與其在詩歌觀念上的重視興寄和諷諫是一致的。寄興諷諫、旨意可取而體格不同者，分為古諷、樂諷和律諷。而只是吟寫情性，或模寫物色者，則作為一般的古體、樂府（以內容少有興寄，與古不同，故稱為新題樂府）和律詩，以相區別。另，又以內容不同而有悼亡、豔詩等類別。

再看白居易對自己詩歌的劃分。其〈與元九書〉曰：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964）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

<sup>74</sup> 同注3，卷三十，頁352-353。

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于執事。（略）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sup>75</sup>

此處所論，除了“新樂府”的劃分似與元氏略有不同外（實白居易的新樂府仍是從內容上所作的區分），其他並無不同，即首先從內容上區分出諷諭、閒適和感傷等不同的類別，再將難以分屬此三類而體裁又為律絕者，另列為雜律詩。清人賀裳謂：“微之〈少陵墓志〉、〈敘詩與樂天書〉，樂天〈寄元九書〉，皆深得六藝之解者。”<sup>76</sup>信然。

## 五、元、白唱和詩的傳播與影響

元稹和白居易的唱和詩歌，在當時曾廣為流傳。這在元、白二人的詩文中多有記述。比如，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就說道：“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

<sup>75</sup> 同注2，卷四十五，頁964。

<sup>76</sup>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57-358。

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于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sup>77</sup>則不僅在當日朝野廣爲流傳，而且還遠播於域外。可以想見其盛況。

元、白唱和之詩傳播如此之廣，受到如此普遍的歡迎，雖未必盡合元稹和白居易的主觀意願，然這仍是足以讓他們感到自豪的。元和十年正月，元稹奉詔還朝，二月抵京。元、白多年分別，一朝相聚，詩歌唱和必不能少。白居易後來在〈與元九書〉中回憶道：“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宗憲）、李（景信）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言語之間，流露出自得之情。長慶初，元、白同以知制誥在朝，曾夜宿南郊齋宮，詩歌唱和，通宵達旦。元稹有詩描寫當時情景道：“兩掖諸公泊翰林學士三十餘人，驚起就聽。逮至卒吏，莫不眾觀。羣公直至侍從，行禮之時，不復聚寐。予與樂天吟哦竟亦不絕。”<sup>78</sup>同樣不免有自誇之意。

元、白唱和以及與其他人的唱和詩曾多次結集。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元、白在越州和杭州時的唱和詩結集爲《杭越寄和詩集》與《三州唱和集》。<sup>79</sup>文宗大和元年（827），《元白唱酬集》結集。稍後，元又追和《白氏長慶集》中未和答者 57 首，合 114 首，題爲《因繼集》卷一。次年，又有《因繼集》卷二、卷三編成。前後唱和詩已有千餘首。如白居易所說，是“其爲敵也，當今不見；其爲多也，從古未聞。”<sup>80</sup>同時，元稹還與李德裕、劉禹錫詩歌唱和，編成《吳越唱和集》。而白居易則與劉禹錫唱和，亦編有《劉白唱和集》。此前，元、白還曾

<sup>77</sup> 同注 3，卷五十一，頁 554-555。

<sup>78</sup> 同注 3，卷二十二〈爲樂天自勸詩集，因思頃年城南醉歸，馬上遞唱豔曲，十餘里不絕（略）〉，頁 252。

<sup>79</sup> 《杭越寄和詩集》包括李諒的詩，《三州唱和集》中也有崔玄亮的詩，但二集以元、白唱和詩為主。

<sup>80</sup> 同注 2，卷二十二，〈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頁 1721。

擬將其與張籍、李紳、盧拱、楊巨源、竇鞏、元宗簡等人的唱和贈答詩合編爲一集，“悉索（二人）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眾君子得擬議于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sup>⑤1</sup>然可惜此事未成。今存張籍詩中僅有數首與元、白唱和的七言律詩。楊巨源與元、白贈答詩亦僅存數首。李紳當時與元、白的唱和贈答詩應多，而今皆不存。竇鞏與元稹越州唱和應多，然今存詩中與元稹往來者極少。盧拱詩今更不存。以至我們今天已很難據之考察元、白與諸人唱和贈答以及相互影響的情形。然李紳的《追昔遊集》三卷，就中所存之詩多爲長篇，多有自注。這與元、白長篇敘事詩的創作頗爲相似。上文我們論及元、白的新題樂府，知其原爲和李紳之作。而元、白敘事詩的創作，時間相當早，則以理推之，李紳此類作品反受元、白影響，當與事實相去不遠。元、白、李三者詩歌創作的互相影響，於此可略見一斑。

元、白唱和當然也有逞才使氣的一面，影響也未必都好，但他卻造成了一種風氣，風氣所被，客觀上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發展，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比如，在文學史上屢爲後人所稱的“元和體”，其實最初主要就是指元、白二人的唱和詩。這一點元稹說得很清楚。他在〈上令狐相公詩啓〉說：“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于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閑感物寓意，可備蒙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閑，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瘠，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閑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効，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閑爲詩者，復相仿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

<sup>⑤1</sup> 同注2，卷四十五〈與元九書〉，頁965-966。



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sup>82</sup>則所謂“元和體”，實際上是指元、白唱和詩中的長篇排律和小碎篇章而已。至於李肇在《唐國史補》卷下中說的，“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以常理推之，不過是元、白唱和詩之“元和詩體”或“元和格”的擴大而已。<sup>83</sup>中唐時期，韓孟唱和、聯句亦多，然不若元、白唱和詩影響為大，則是顯然的。

至晚唐，皮日體、陸龜蒙松陵唱和，長篇短制，多效元、白，結成《松陵集》行世，成就卓然。宋初詩歌唱和的風氣很盛。詩壇“三體”，“白體”受元、白影響，固不用說，即西昆派之唱和，雖是詩學李商隱，然唱和往復，相互競爭，也深受元、白以來唱和風氣的影響。元祐時期，蘇軾、黃庭堅等“蘇門”諸人的唱和，雖較元、白唱和又有新的發展，然元、白唱和的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這裏就不再贅論了。

<sup>82</sup> 《元稹集補遺》卷二。白居易也說：“眾稱元、白為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詩中自注）

<sup>83</sup> 元、白其他文體的創作，在當時也影響很大。如元稹的制誥，文辭高古（《白居易集》卷二十三〈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謂：“制從長慶辭高古”，自注：“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効之也”）；白居易的書詔批答，也成為典式（《元稹集》卷二十二〈酬樂天餘思未盡加為六韻之作〉詩句有“白樸流傳用轉新”，自注曰：“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式，禁中號曰‘白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也”）。



# On Yuan Zhen and Bai Juyi's Poems of Exchange

*Gong, Bengdong*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Yuan Zhen and Bai Juyi are associating for thirty years, the poems of exchange about thousand. The exchange of poems, not only promoted allegorical poem of them, but also improved poem style and theory of them ,besides push the poem creating the Tang Dynasty forward.

**Keywords:** Poems of Exchange, Yuan Zhen, Bai Juyi

